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观：内涵和特征*

□ 李　丹

〔提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发展遭遇逆流、发展赤字不断加剧、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人与自然矛盾日益突出等困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要判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凝练出关于认识全球发展本质、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系统回答了全球语境下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依靠什么、如何共同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发展观的全球拓展版本。它以鲜明的人本性、科学性、前瞻性、实践性，为改革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对于弥合全球发展鸿沟、引领全球发展方向、支撑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发展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 键 词〕全球发展观、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6）5 期 0022-22

* 本文系厦门市社科联、厦门市社科院资助的厦门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项目（协议号：XM2026ZDB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加大援外力度，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2]。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还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和理论品格的全球发展观。全面分析中国全球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与鲜明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贯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一、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观的形成背景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概念诞生于二战结束之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发展时代正在向全球发展新时代演进。

（一）国际发展主体向全球拓展

全球发展始于国际发展。伴随着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地区诞生了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国际发展——利用富裕、较发达国家的资源和知识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应运而生。美国杜鲁门政府推出的“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计划，被认为是开启国际发展时代的先声。发达国家先后建立自己的发展援助机构，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2 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45 页。

协同开展国际发展援助。发达国家是国际发展的主体、主导者、施与者，发展中国家是受体、被援助者、受捐助方，由此导致用于解决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理论、政策、实践统统由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发展体系炮制、出台与推行。[1]

直到 21 世纪初新兴经济体崛起并投入到国际发展领域后，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发展理念、支配国际发展实践的局面才开始改变。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升”力量与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北降”颓势形成鲜明对照，国际发展主体向南方扩展。2013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报告中明确肯定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中的主体地位。2015 年，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声明“本议程是为人类、地球与繁荣制订的行动计划”，“所有国家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将携手合作，共同执行这一计划”。[2] 这一宏大的发展目标体系超越了西方视域的局限，其中发展不再仅被视为服务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不再仅从发达国家角度为“发展中的世界”制定发展方案。[3] 人口、面积及国家数目占世界 2/3 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平等发展主体，自主参与发展议程设置，这是国际发展时代向全球发展新时代转变的重要标志。除国家之外，各种社会团体、工商企业、慈善组织、媒体智库、大学与科研机构等行为体，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发展事业中。南北共治、多元协作的全球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二）国际发展日益成为全球议题

二战后初期，发展问题被认为是专属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是帮助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拯救者”。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

---

[1] 李丹：《新理念、新模式：中国参与国际发展的贡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第 56 页。

[2]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1 页，https://sdgs.un.org/zh/2030agenda。

[3] 郭秋梅、卢勇：《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体系转型》，《国际论坛》2025 年第 1 期，第 73-74 页。

环境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同时，伴随着人口危机、粮食危机、地区冲突等问题蔓延全球，各国才开始意识到发展问题的关联性，“欧美政学两界开始广泛讨论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等南北关系问题，全球治理由此浮出水面”[1]。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战略目标，也由针对贫困国家调整为“大力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实现发展的最终目标——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条件”[2]。进入 21 世纪以来，联合国通过制定“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构筑起了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维度的全球发展目标体系，将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三方合作一起，并列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西方金融监管、债务风险对全球发展的拖累，南北共治发展问题开始进入了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二十国集团（G20）的视野和议程。2016 年，G20 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突出位置，中国领导人倡导要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2024 年 9 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了《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多边合作，建设一个安全、和平、公正、平等、包容、可持续和繁荣的世界。2025 年 11 月，G20 峰会首次落地非洲大陆，会议聚焦地缘政治冲突、债务可持续性、能源转型、粮食安全等议题，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局凝聚共识。

（三）西方发展援助体系亟待转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21 年指出，世界必须跨越“六大鸿沟”，即和平鸿沟、气候鸿沟、贫富鸿沟、性别鸿沟、数字鸿沟和代际鸿沟。[3] 这些鸿沟均与国际发展失衡直接间接相关。除亚洲外，发展中世界正在成为无发展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近 30 年来不断下降——从 2000 年代的平均 6%

---

[1]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规则和制度为例》，《国际观察》2024 年第 2 期，第 98-99 页。

[2]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联合国大会第 35/56 号决议，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128 页，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35-56。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增进本国公民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增进人类共同未来的利益》，联合国新闻网，2021 年 9 月 21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9/1091382。

降到 2010 年代的 5%，到 2020 年代降到 4% 以下。[1] 同时，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导致的资源枯竭、土地退化、疫病流行等问题，正不断加剧全人类的生存危机。然而，全球发展领域资金缺口扩大的问题却在加剧。联合国《2024 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显示，发展领域目前每年的融资缺口高达 4 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核心组成部分。[2]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连续缩减。特朗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大幅削减援助金额，日本和欧洲用于社会保障和防卫的费用不断挤压援外预算。德国在美国援助减半后跃升为最大援助国，也在频频质疑发展援助的必要性。联合国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ODA）2024 年降至 2146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将进一步下降 10% 至 18%，其中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的降幅可能高达 25%。[3]

不仅如此，西方国际发展援助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均受到广泛质疑。有实证研究指出，外援对婴儿死亡率与人类发展指数等总体福利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资金管理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4] 还有学者甚至得出国际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的结论。[5] 援助有效性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出西方国际发展援助体系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的弊端。[6]

---

［1］《除衰退外全球经济将创下 2008 年以来最慢增速》，世界银行集团网站，2025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5/06/10/global-economic-prospects-june-2025-press-release。

［2］"The 2024 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t a Crossroads,"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pril 2024, p.iii,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4.

［3］《联合国最新报告警示：全球碎片化加剧融资压力，发展成果面临逆转风险》，联合国网站，2026 年 4 月 9 日，https://financing.desa.un.org/zh/iatf/news。

［4］José Alves, Cláudia Couto, and José Carlos Coelho,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Aggregate Welfare Measure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Vol.15, No.1, 2024, pp.1210-1230.

［5］Chung-Yee Liew, Masoud Rashid Mohamed, and Said Seif Mzee,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Economic Growth of East Af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3, No.12, 2012, pp.129-138.

［6］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135 页。

这些无不表明，单凭西方之力已经无法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发展赤字。2010年以来，南非、墨西哥、印度、埃及、沙特阿拉伯、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纷纷成立专门的发展援助机构。[1] 这些新兴经济体基于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团结协作的原则，联合自强追求共同繁荣，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探索发展道路进程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对于国情相似、经历相近的全球南方国家更具适用性。“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坚持独立自主，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2] 面对保护主义逆流，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让全球南方国家公平参与国际合作、共享发展成果，成为促进全球发展的先锋力量。

（四）中国实践积累丰富发展经验

中国全球发展观并非凭空建构的话语，而是中国国内发展理念、价值立场与实践成就长期积淀、拓展升华的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发展逻辑从国内场域向全球场域的自然延伸。

发展优先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将“坚持发展优先”列为全球发展倡议“六大坚持”之首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视发展为“硬道理”和“金钥匙”，并将其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经过40余年持之以恒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来保持在30%左右，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

---

[1] 南非2011年启动筹建发展伙伴署（SADPA），墨西哥同年设立国际发展合作署（AMEXCID），印度2012年设立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DPA），埃及2014年设立伙伴关系与发展署（EAPD），沙特阿拉伯2015年设立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与救济中心（KSrelief），中国2018年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印度尼西亚2019年设立国际发展合作署（Indo-AID）。

[2]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勇做先锋力量——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讲话》，《人民日报》2026年9月13日，第2版。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发展观的内在理念根基。中国发展观的核心命题是“发展为了谁”。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是，“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建成规模宏大的民生保障体系。这套经本土实践检验的价值追求，从一国治理延伸至全球发展议题：立足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坚持把发展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坚决摒弃西方发展模式中重资本轻人民的价值偏差，从而实现了国内发展理念与全球发展理念的内在贯通。

中国发展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全球发展观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与话语支撑。伴随综合国力、产业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合作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完成了从融入全球发展到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发展的角色转型，开始以自身发展赋能全球共同发展，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发展理念。中国不断拓宽发展思路、发展理念，坚持与各国一道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2] 公平的发展，在国内层面是使每个人共享发展成果，在国际层面就是使各国都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开放的发展，在国内层面是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在国际层面就是与各国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全面的发展，在国内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在国际层面就是对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的发展，在国内层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层面就是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助力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全球发展观源于本土、成于实践，是中国积累的发展智慧、发展经验在全球场域的系统性表达。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

[1]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79 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人民日报》2016 年 12 月 2 日，第 10 版。

上以“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从此“全球发展”这一概念成为他在重大国际场合演讲的高频词。2022 年，中国发起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与各国共商全球发展大计。习近平主席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发言主题，提出“我们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信心，起而行之，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推动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1]。可以说，形成于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发展范式正迈入突破南北二元结构、全球共谋发展、共促发展的全球发展新时代。[2]

二、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观的主要内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时代大势，相继提出了“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时代”“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推动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发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一系列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新时代发展中大国独具特色的全球发展观。这一系统的全球发展理论体系，其主要内涵可概括为体用结合的全球发展世界观、南北一体的全球发展合作观、鱼渔并授的全球发展援助观、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治理观、弘义融利的全球发展价值观。

（一）体用结合的全球发展世界观

中国的全球发展观不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相兼、和衷共

[1]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5 日，第 2 版。

[2] 姚帅：《亚洲时刻：新时代的全球发展治理与地区合作》，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5 页。

济、天下大同等理念，承继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蕴含的人类解放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源于新中国外交处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贯原则，更是直接形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内生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于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全球发展观的集中表达。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系统回答了全球语境下“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依靠什么、如何共同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关于全球发展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全球发展倡议的本体论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上，认为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主张“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论集中体现在“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一根本问题上，坚持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强调“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全球发展倡议的认识论体现为直面发展赤字，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动荡冲突、对抗对立的根源是发展失衡，提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主张将发展重新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全球发展倡议的方法论突出体现在统筹兼顾和务实行动上，强调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生态、发展与创新的关系，实现本国发展和全球发展的统一，并将发展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实现知行合一。因此，全球发展倡议并非单纯的议程动员和政策倡议，而是中国全球发展观的系统表达，体现了中国关于全球发展的一整套世界观，它以全球一体的本体论立基，以人民中心价值论定向，以发展优先认识论破题，以行动导向方法论落地，从而在性质上实现对西方国际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超越，在场域上完成从南北议程到全人类发展议程的扩容。

（二）南北一体的全球发展合作观

全球发展的路径和手段包括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援助、全球发展治理等，其中全球发展合作是推进全球发展的主要方式。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决定了全球发展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研究表明，当前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依赖于从其他地区进口 25% 或以上的基本商品和服务。[1] 习近平主席将中国的发展称为“合作的发展”——“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2]。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使用了“全球发展合作”的概念。[3]“如果说 20 世纪的发展合作，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合作，主要是由北向南，由发达国家主导，在 21 世纪的今天，发展合作变得更加多元化：由北向南，由南向南，甚至由南向北的合作日益增多。”[4] 相比于过去强调北方对南方“援助比例”和“白人负担”的国际发展理念，全球发展合作更强调发展合作的全球性、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从合作结构上看，全球发展合作强调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往国际发展合作是南北垂直分层结构——发达国家是教师爷、施与者、主导方、评判者，发展中国家则被动接受经验、资金、规则与话语。全球发展合作将发展中国家从客体还原为主体，不仅形成了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新型金融机制共建共享等多元合作模式，而且还致力于打造国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城市等共同参与的扁平化伙伴关系网络，使全球发展真正惠及人类整体，而不是某一类国家、某一类主体。

---

［1］《2023/2024 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2024 年 3 月 13 日，第 16 页，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document/hdr2023-24overviewch.pdf。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4-275 页。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2 页。

［4］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一带一路”发展学——全球共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2023 年 10 月 18 日，第 5 页，https://f1.xhinst.net/group1/M00/00/65/CgoMm2Uvl-2ALbAFABgzYzYpLjE397.pdf。

从合作目标上看，全球发展合作追求的是各国共同发展、世界普遍繁荣。以往国际发展合作隐含“西方 = 发达 / 现代、南方 = 落后 / 传统”的进化论预设，其目标是通过制度移植将欠发达国家改造为“更像西方”的市场经济体，本质是单一现代化路径的输出。全球发展合作拒绝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目标指向各国共同发展，共建未来。中国信奉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1]。

从合作性质上看，全球发展合作观强调平等互利合作，注重整体收益。合作本质上是平等的，做不到平等就不是真正的合作。平等是中国对外合作不同于西方国家之处，也是中国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经济条件、不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的根本原因。互利则是平等在实践中的延伸，也是合作的动力。“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2]，因为只有互利合作才能创造增量价值，产生“1+1>2”的效应。如果只是单方面受益，这种合作无异于将别人所失变为自己所得，既无整体收益也无法深入持久。在这个意义上，互利的确是“合作法宝”，是检验全球发展是否造福人类整体福利的试金石。

（三）鱼渔并授的全球发展援助观

1960—2020 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官方发展援助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3] 但时至今日，众多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经济振兴、民生改善的发展目标，反而陷入了贫困动荡、对外依赖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越援越穷”怪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援助模式没有也无意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符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发展模式。有限的外部援助难以转化为摆脱贫困的生产力，甚至还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患上“援助依赖症”，直接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465 页。

[2] 同上，第 438 页。

[3]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 2023：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24 页。

或间接剥夺他们的发展自主性和选择权。[1]

不同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援助模式，中国的发展援助合作始终从对方需要出发、为对方利益着想、与对方意愿一致，坚持“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相结合、外部援助与自主发展相结合。一方面，中国力所能及地“授人以鱼”。2019 年 9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显示，中国开展对外援助 60 多年来，共向 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 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 60 多万名援助人员，先后 7 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2]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达到 2702 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提供无偿援助 1278 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 47.30%，重点用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3]2018 年至 2024 年，除抗疫援助外，中国向 40 多个国家实施了 800 多个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还向 30 多个国家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4]

另一方面，中国尽力而为地“授人以渔”。“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并非两种对立的援助方式，而是实现发展目标的两类互补手段。前者强调短期救助与物质供给，旨在满足受援国的迫切需求；后者注重能力建设与方法指导，旨在提升其自主发展与可持续成长的内生动力。多年实践表明，在“中心—外围”结构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单靠输血型援助，无法帮助欠发达国家

---

［1］ 参见 William Easterly, “Planners versus Searchers in Foreign Aid,”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23, No.2, 2006, pp.1-35;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Robert Calderisi, *The Trouble with Africa: Why Foreign Aid Isn’t Wor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7。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第 12 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11 日，第 14 版。

［4］ 国合平：《美对外援助“竞赢中国”，不如学习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4 年 3 月 26 日，http://www.cidca.gov.cn/2024-03/26/c_1130095903.htm。

摆脱贫困，反而由于西方国家附加的援助条件而加剧南北关系的不平等。因此，中国提出“授人以渔，自主发展”的政策主张，强调“充分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发展诉求，通过多种方式毫无保留地将发展经验和行业技术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尽力为其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1] 近年来，中国为 180 多个国家和组织培养了 50 多万名各类人才 [2]，通过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帮助各国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中国还通过建设“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经验交流。因此，“鱼渔并授”的发展援助观是“大援助观”，主张在提供必要援助的同时，帮助受援国建立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援助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这才是设身处地、想人所想的援助之道。如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合作促进了共建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其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水平，推动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拓宽其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使之获得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中国将工业化合作确定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领域，通过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与新型工业化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强其发展新兴产业的能力，助力其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总之，“鱼渔并授”的全球发展援助观创新了全球发展援助模式，突破了简单给予、单向施予的传统援助逻辑，转向立足长远转型、着眼自主发展的共同成长理念。这种援助模式不仅提升了援助的实效性与持续性，也为全球发展合作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可行性的全新方案。

（四）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治理观

全球发展治理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发展领域的问题和挑战、最大限度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2] 《中国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已为 180 多个国家和组织培养超 50 万名人才》，新华网，2025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627/a847f41fab0e475a8afffc5341890dcb/c.html。

发展水平、增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协同发展行为与过程。“全球治理”一词的提出与发展问题紧密相关。1989 年世界银行发布《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Sub-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报告，首次使用“治理危机”来形容当时非洲的发展状况。此后世界银行在多份报告里强调治理与发展的关联性，称“治理质量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核心”[1]，“治理是国家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资源以促进发展方面行使权力的方式”[2]，“善治等同于良好的发展管理”[3]。当前全球发展形势日趋严峻，除了金融危机、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拖累因素外，全球治理的低效性、滞后性、碎片化也难逃其咎。

针对西方发展治理模式的种种弊病，中国大力倡导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治理理念，为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完善变革提供可行方案。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4]“共建”是指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充分发挥各发展主体的比较优势，鼓励各方平等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各环节，“集众智、汇众力，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5]。中国主张超越西方主导视角和由北到南的国际向度，立足全球一体、命运与共的高度，以南北共襄的地球村视域看待发展问题，提出携手营造开放联动的全球发展环境，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创普惠平衡、

---

［1］ The World Bank, “The Long-Term Perspective Study of Sub-Saharan Africa (Vol.1),” 1990,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850101468774534561/pdf/The-long-term-perspective-study-of-sub-Saharan-Africa-country-perspectives.pdf.

［2］ The World Bank, “Managing Development: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A Discussion Paper),” 1991,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884111468134710535/pdf/34899.pdf.

［3］ The World Bank,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1992,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604951468739447676/pdf/multi-page.pdf.

［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8 页。

［5］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13 页。

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格局。

“共享”是“共建”环节的逻辑延伸，也是全球发展治理的要义。当前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的最尖锐挑战是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均，美欧发达国家坐享各种红利，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技术流动中的占比与其人口规模严重不匹配，马太效应持续加剧。没有共享导向，市场机制只会扩大而非缩小差距。中国领导人将共享发展称为“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径”[1]，“回顾历史，每当各国能够团结合作、共享成果时，全球发展就能稳健推进，大家都从中受益”[2]。中国主张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兼顾合作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使合作成果惠泽各方。全球发展倡议以坚持普惠包容为重要原则，直接回应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困境，要求发展成果覆盖所有国家和群体，这正是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关切。全球发展治理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治理对共享的要求都更根本、更迫切，因为相较于全球安全、气候、卫生等专项治理着眼于应对已然显现的危机，全球发展治理属于基础性议题，致力于化解各类全球性挑战的深层根源、潜在风险。发展成果不能共享，安全治理就缺乏社会基础——青年失业率是冲突爆发最强的预测指标之一；贫困不能消除，气候公正治理就是空话——穷人不可能为了减排而不顾生存；发展鸿沟不断扩大，卫生治理便无从谈起——电力供应都不稳定的国家，疫苗研发和保存难以获得保障。只有使各国共享成果、民众普遍受益，这样的全球发展治理才是有效的治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3]，是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全球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

[1] 《习近平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1 日，第 1 版。

[2] 李强：《在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

[3] 习近平：《坚守初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1 月 19 日，第 2 版。

（五）弘义融利的全球发展道义观

义利兼顾、义高于利、弘义融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上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特征。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将其概括为正确义利观，并多次就此作出论述。首先要以义为先、以义为重、以义为大。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通过义利观区分道德境界与人格美丑。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开展发展合作的价值导向，这里的“义”是指大义、国际道义。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2014 年 11 月，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对“义”的含义作出进一步阐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 虽然正确义利观最早是在中国与周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语境下提出的，但其后被赋予更广泛的内涵。在与发达国家合作时，中国同样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3]。

其次要互利共赢、弘义融利、天下同利。这里的“利”指的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非一国一己之私利。倡导正确义利观并非不讲物质利益、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是不顾合理利益关切，将义利关系绝对化、对立化。当今世界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粮食安全、基本医疗、清洁饮水等生存性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对于这些地区和人民而言，“利”首先意味着活下去、活得有尊严的物质条件。中国主张互利共赢的根本着眼点正在于此：全球发展必须首先回应世界最广大人民最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不是服务于少数国家或利益集团的资本增殖与战略私利。中华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反对的是私利无限膨胀、只顾个人利益；天下苍生的衣食温饱、黎民百姓的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99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3-444 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1 页。

民生之利，则为天下之利，是应有之利。因此，义利之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公利与私利之辨”，“义和利实际上是统一的，或者说应该是统一的”。[1]在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利益的纷争是永恒而绝对的，以此为思想根基的利益观，认为国家间的利益是不兼容的，是你有我无、你多我少的零和关系。中国的全球发展道义观则主张，“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3]。总之，正确义利观为中国的全球发展观注入价值灵魂，倡导并践行弘义融利，让这一发展主张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三、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观是百年变局下“为什么要推动全球发展、推动什么样的全球发展、谁来推动全球发展、如何推动全球发展”等问题的系统思考和阐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发展向度的表现，是共同富裕理论在国际维度的体现，具有鲜明的人本性、科学性、前瞻性、实践性特征。

（一）关注全球共同发展的人本性

中国全球发展观的人本属性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以人为本，把人视为发展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发展目标导向下，人的发展长期被资本逻辑异化：以物为本，人为物役，将物质财富的增长视作目的，而把人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相比于“见物不见人”的资本至上论，中国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于发展的各个环节，将“一切为了人民”视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根本立场，提出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为了人民而发展，

[1] 梁涛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8-119 页。

[2]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5 日，第 2 版。

[3]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0 日，第 7 版。

发展才有意义”[1]。二是注重民生，重视民众的经济利益。从古代“仓廪实则知礼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到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再到习近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人的发展观向来强调富民裕民的重要性，“民生问题大于天”也同样适合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现实。“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2] 三是人人共享，让发展成果普惠天下。中国人信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领导人主张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创造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发展局面”[3]。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全球发展成果，这是中国全球发展观人本性的终极体现，也是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以人为本、注重民生、人人共享，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为世界谋大同”的胸怀与担当，是中国全球发展观的“根”和“魂”。

（二）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性

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观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敏锐洞察和精准把握上。进入数智化时代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清醒认识到，数字技术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是全球增长的核心引擎。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强调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4] 这一主张的根本着眼点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76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91 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76 页。

[4] 同上，第 469 页。

在于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实现跨越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传统发展模式边际效益递减，新的差距不公随着技术进步正在形成。唯有创新，才能开辟新的增长源泉，重塑全球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唯有创新，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支撑；唯有创新，才能缩小南北鸿沟，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角落。对中国而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创新是抓住数字机遇、实现弯道超车的战略机遇；对发达国家而言，创新同样是保持竞争优势、应对各种挑战的必由之路。只有各国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新成果普惠共享，世界经济才能渡过难关，南北双方才能协同发展，共同迈向普遍繁荣的美好未来。为此，中国反对以邻为壑的技术民族主义和科技保护主义，强调“科技创新成果不应该被封锁起来，不应该成为只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1]。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数字普惠行动倡议》，明确呼吁各方“强化技术引领，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2]，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三）重视绿色低碳发展的前瞻性

面对气候变化、生态退化与资源紧张等全球性挑战，中国以前瞻思维将绿色发展作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强调绿色发展既关乎人类自身生存延续，也关系全球发展的动力机遇，更关乎全球发展的价值目标。第一，绿色发展彰显全球发展的真谛。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是与天地万物共享、与自然互依共生的发展，是生态友好的发展。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无限度地开采、无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将导致地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最终使人类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8 页。

[2] 《全球发展倡议数字普惠行动倡议》，中国网信网，2025 年 11 月 8 日，https://www.cac.gov.cn/2025-11/08/c_1764241580690230.htm。

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 因此，绿色发展是真正的全球发展、立足地球整体的发展。第二，绿色发展关乎全球发展动力。“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2] 绿色发展不仅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 绿色低碳转型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新引擎、创新的新机遇。中国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动力和潜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电池、电机到智能化解决方案，大幅降低了汽车的碳排放，也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弯道超车”，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国以前瞻眼光进行产业布局的生态自觉。第三，绿色发展关乎全球发展的未来。绿色发展是统筹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也是联结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绿色发展关乎人类文明的传承延续，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历史教训延续至今，工业文明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到头来只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绿色发展观是将生态逻辑与发展逻辑统一起来的前瞻性思维，指向的是一种全球发展新范式：不以透支未来为代价，不以掠夺资源红利为手段，不以转嫁生态成本为捷径。综上，重视绿色发展是中国全球发展观的突出亮点，这一理念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持续转型的思想指引，也为重塑全球发展逻辑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

（四）倡导以行动促发展的实践性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观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直面全球发展的矛盾与赤字、回应时代呼声和各国关切的务实倡议和切实行动。共建“一带一路”与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观落地生根的实践探索。习近平

[1]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75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35 页。

[3]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4 日，第 3 版。

主席强调要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待共建“一带一路”，将其打造为“减贫之路”“增长之路”，共建“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1]。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也是最能体现中国实干精神的合作项目。西方传统的发展援助模式注重医疗、教育、人权等“软件”援助，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高度逐利的西方资本也缺乏为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提供大规模融资的意愿。作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休戚与共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深知设施联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性、重要性、关键性。“要想富，先修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发展经验使中国不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利润少、风险大的挑战，全力投入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将交通、通讯、能源联通作为共建国家的早期收获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成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助力，也成为支持联合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力助攻，获得了共建国家和联合国的高度赞赏。

全球发展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决定了行动导向的重要意义。全球发展倡议坚持行动导向原则，强调务实目标。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就是希望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倡议在本地区落地生根，助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2]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发展格局深刻调整的新

[1]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人民日报》2017 年 5 月 15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形势，围绕全球发展赤字、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治理、全球发展动力、全球发展目标等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新理念，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促进人类共同繁荣提供了新思路新见解。其蕴含的全球发展观展现了中国的时代责任和大国担当[1]——以南北各国、发展各方为平等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全球合作、发展援助、共同治理为路径，以绿色化数字化创新发展为动力，以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为目标。中国的全球发展观超越了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发展观，既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在国际维度的拓展运用，也是对青岛上合峰会上提出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等“五观”的丰富完善。中国不仅在实践中成为共促全球发展的引领力量，也在理论上凝练出带有自身特色和独特标识的全球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对提升中国在全球发展事业中的话语权、助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习近平总书记三度以“共担时代责任”为主题发表关于全球发展的国际演讲，一是于2017年1月17日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二〇一七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二是于2024年11月16日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三是于2026年9月12日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 勇做先锋力量——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讲话》。